

当代中国学术文库

多维 当代文学 勘探与 审美批判

陈振华◎著

DangDai WenXue
Duo Wei KanTan Yu
ShenMei PiPan



光明日报出版社

当代中国学术文库

多维 勘探与 审美批判

当代文学

审美批判

陈振华◎著



Dang Dai Wen Xue
Duo Wei Kan Tan
Shen Mei Pi Pan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文学多维勘探与审美批判 / 陈振华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112-8704-5

I. ①当… II. ①陈… III. ①当代文学—文学评论—
中国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9318 号

当代文学多维勘探与审美批判

著 者: 陈振华

责任编辑: 曹美娜

责任校对: 张明明

封面设计: 中联学林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8 (咨询), 67078870 (发行), 67019571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caomeina@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29 千字

印 张: 14.5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8704-5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访谈：今天我们需要学理性的批评（代序）

——青年文艺评论家陈振华访谈

第五届安徽省文联文艺评论奖于2014年6月20日揭晓。我省青年评论家陈振华博士凭借其理论专著《小说反讽叙事——基于中国新时期的研究》荣获本届活动唯一的一等奖。近日，本刊就论著的写作构思，写作体会以及当下的文学评论看法等话题对陈振华进行了专访。

李研：陈老师你好！首先祝贺你获得第五届省文联文艺评论一等奖。

陈振华：谢谢！

李研：你认为你的专著能从这么多高水准的论著和论文中脱颖而出，关键在哪里？

陈振华：公正、公开、公平的评审和选拔，迄今为止，我还不知道这届评委会由哪些人员组成，首先我认为这是一次。其次是评委看重这部学术著作的思想深度和学理品格。

李研：我看到你以前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文艺争鸣》《当代文坛》《小说评论》等多家报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当代文学评论，都非常具有学院派色彩和学理性品格，感觉你的理论批评是学院派的。你认可这种说法吗？

陈振华：我不介意您这种定位或评价。可以这么说，这也是我多年来一贯的致思方式。近些年来的批评大幅度地商业化、庸俗化和市场化了。棒杀、捧杀、言不由衷、红包批评、媒体炒作等无良批评无处不在，真正有分量有价值有良心的学理性批评并不多见，这给我们的文学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文学界、评论界的有识

之士应该集体行动起来进行有效抵制,还文学评论一个正常的语境和健康的生态,让真实、有良知、有卓识的评论引领文学创作的良性发展。

李研:在我看来,你的这部获奖论著是从一个特定角度——反讽,对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做了深入的思考、分析和评判。请谈谈你为什么要选取“反讽”作为论著的研究角度。

陈振华: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阅读、感受和体验过程中,我发现“反讽”作为叙事现象普遍存在,出现“思潮性”的叙事征候,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历史特征,从而我发觉,“反讽”是新时期文学的一条主导性线索,它几乎贯穿了新时期文学的始终。从新时期以来的非反讽叙事,到反讽叙事的发生、发展、高潮、泛化、陨落,“反讽”呈现出“升腾与坠落”的叙事轨迹,但这仅仅是“反讽”的叙事表象。在叙事表象的背后,这种叙事形式有没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意味,引起了浓厚的兴趣。经系统研究和梳理,我发现,在“反讽的时代”,“反讽”既是这个时代的美学遭遇,也是这个时代的思想境遇和精神修辞,它深刻地阐释了新时期历史文化语境、精神结构与思想地形图的变迁。这就是我将“反讽”作为论著独特视角的原因所在。

李研:你的论著采取历史分析和审美阐释,理论统摄与文本支撑,史与论相结合的研究思路,既有宏观的历史勾勒,又有细部的严谨论证,你的独立不倚的价值判断都是基于学理性的分析,令人信服。这一定与你全面系统的考察、大量的作品阅读、深入的思考研究以及丰厚的知识储备密不可分。

陈振华:是的,不瞒你说,这部书耗时三年。它需要大量的阅读,如果阅读量不够,不全面,将会在论述中以偏概全。所以我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对新时期的文学文本进行了系统阅读,很多是第二次阅读,但这一次是带着目的去阅读的,所以更有效率,更加深入;同时,还要有大量的理论储备。所以我从古希腊时期的反讽理论开始梳理,对反讽的历史演变进行了系谱学的考察,基本弄清楚了它的历史源流;最重要的是反讽的精神实质暗合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流变与思想变迁。从“伤痕”、“反思”的历史控诉到欲望时代的叙事喧嚣,从新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到存在主义文学思潮再到解构主义文学思潮,从1980年代的人道主义叙事、人性论、张扬人的主体性到1990年代主体性的颓败、“人”的死亡,叙述反讽一直引领着历史转变时期的叙事潮流。我不会轻易地下判断,所有的评判都要基于历史的、系统的、文本的学理性分析。

李研:你把新时期文学定义为反讽时代的文学,究竟想表达哪些深层的意思?

陈振华:“新时期”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思潮激荡的“大时代”,从解放思想,砸碎“文革”的思想坚冰,摆脱“极左”意识形态的禁锢始,至消费意识形态的兴起,“新时期”一直在寻找着自己的思想定位和价值坐标,但苦于没有实现。启蒙主义、人道主义、存在主义、国学热、道德理想主义、人文精神大讨论、自由主义、新左派、民族主义……“新时期”不倦地寻找又不断地迷失。传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系统业已破碎,无法整合起世道人心,新的信仰体系和价值维度还没有最终确立,这注定了新时期是一个“众神狂欢”的反讽时代。同样,文学也正处于“反讽的冬季”,反讽是时代所选择的叙事样态。

李研:我觉得,您所界定的“修辞论”、“叙事论”和“存在论”意义上的反讽,非常富有见地,很好地阐释了新时期的叙事文本,并凭借反讽叙事样态的深度分析找到了它和新时期时代精神结构嬗变之间的隐秘联系。这样的“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陈振华:反讽在西方世界被称作现代文学最伟大的遗产之一,被认为是揭示现代生存悖论和存在困境最有效的工具,因此,反讽才有了从古典修辞论向近现代本体论和存在论的嬗变。同样,在“新时期”转型中的中国,历史误置、社会演化或多重错位的文明情境使得中国当下的思想文化一直处在“破>立”的激荡状态,正是这种“破>立”的思想境遇,给反讽叙事提供了足够的思想能量和颠覆激情,才酿成了反讽叙事的思潮性特征,才有了反讽叙事向本体论、存在论的领域深度挺进。在此意义上,反讽叙事已不仅仅是表达的形式问题,而是表达的实质问题,亦即探讨新时期反讽叙事就不能过多地强调与传统反讽修辞的联系,而应该从“新时期”的生存困境和文化处境中去把握反讽叙事的实质。新时期反讽叙事“升腾与坠落”的流变轨迹,恰好印证了反讽叙事的现代性内涵,反讽叙事因对“新时期”生存悖论的深刻揭示,成为阐释中国生活和中国问题的绝佳范式。

李研:你在这本书中还用专章论述了反讽叙事的后现代性。你似乎是持一种批判性态度对待反讽叙事的后现代转向。你的依据是什么?

陈振华:平面、空心、涣散、游戏、表象的后现代反讽叙事景观抽空了反讽的思想内涵,祛除了反讽的价值承担,尽管表面上还维持着叙事的繁荣,可精神价值已经开始沉寂。这样的反讽叙事看似生机勃勃,实则很难生成气象,不再具有重大

精神现象学的意义。由此,在耗尽了批判、颠覆的激情以及履行完思想使命之后,反讽叙事遭遇到了美学的难题和思想的困境。

李研:新时期文学成长期,反讽的叙事价值体现为批判性;鼎盛期,反讽的叙事功能表现为解构性;消褪期,反讽成为欲望时代的叙事表征,我基本赞同您的观点。但时代境遇的反讽性决定了反讽不可或缺,在既无肯定又无否定,“亦此亦彼”的多元情境中,反讽成了人们摒弃“非此即彼”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之后的话语方式和生存态度。在反讽的批判精神丧失之后,反讽叙事将会何去何从?

陈振华:确实,反讽叙述的不及物,游戏历史的泛讽,反讽叙事的表象化,不加选择的反讽,对反讽自由的过度挥霍,反讽和消费意识形态的暧昧,反讽叙述价值维度的缺失,对反讽叙事伦理的缺乏反省……将反讽引上了泛讽的歧途。反讽由此失去了思想的支撑点和精神的聚焦点,导致了批判精神的萎缩、思想光芒的收敛和反叛激情的消解。批判型的反讽者也因此蜕变为游戏型的反讽主义者。如此,反讽何为?我以为,出路也许是唯一的:只有在现实经验的基础上又不断地超越“存在”的经验层面,向着“存在”的深度、悖论、荒诞甚至虚无作不懈的追问与勘探,回归反讽的批判精神,反讽叙事才有可能走出困境。

李研:很佩服你的学术眼光和独到见解。

陈振华:算不上独到见解,一家之言而已。只不过反讽的命意正好与我属己的精神症候不期而遇,乃有此论。

李研:我们期待陈老师在学理性批评方面有更多的建树。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原载《安徽文艺界》,2014年第4期)

目 录

CONTENTS

第一辑 文学思潮与文艺理论 1

重建当下文学创作的政治维度与现实关切

——纪念《讲话》发表 70 周年,兼论当下文学创作 3

故事的张力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 13

“策略”选择与 20 世纪 90 年代文学 28

存在的多样与指向的虚无

——“晚生代”小说叙事分析 37

非反讽者·反讽者·反讽主义者

——新时期小说叙事主体的另一种考察 45

解构思维与文学史写作 54

从精神实质到形式本体

——从“现代派”到“先锋文学”的叙事位移 61

第二辑 当代作家与当代作品 67

精神寻绎与叙事嬗递 69

严歌苓的人性建构与人道关怀 79

人性原色的审美勘探与艺术表达

——试论苏童的人道主义叙事 96

过于温情的民间道德化叙事

——刘玉堂“新乡土小说”文化意识批判 110

真实与虚幻的迷宫

——莫言《酒国》与卡夫卡《城堡》之比较 118

异化·沉沦·荒谬

——刘震云小说“存在”主题阐释 125

第三辑 安徽作家及作品研究 135

从镜像真实到荒诞真实

——刘克创作论 137

“徽商家族史”多重叙述品格的艺术辩证

——季宇长篇小说《新安家族》简论 162

生命着,才知道了这一切

——许辉中短篇小说创作简论 171

《翁同龢》历史叙事的“真实性”诉求

——潘小平长篇小说《翁同龢》阐释 180

“新乡土”镜像的故事呈现与经验主义写作

——评陈斌先《吹不响的哨子》及其乡土叙事 190

“后信仰时代”红色叙事何以“返魅”

——简论赵宏兴长篇小说《隐秘的岁月》 196

历史叙述的真实、认知及其话语的德性

——评季宇长篇历史纪实文学《燃烧的铁血旗》 203

历史与时代的多维镜像

——简论“诗人”严阵的小说创作 212

第一辑

01

| 文学思潮与文艺理论 |

1. 重建当下文学的政治维度与现实关切
2. 故事的张力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
3. 策略选择与 20 世纪 90 年代文学
4. 存在的多样与指向的虚无
5. 反讽叙事蜕变及其主体位移
6. 解构思维与文学史写作
7. 从精神实质到形式本体

重建当下文学创作的政治维度与现实关切

——纪念《讲话》发表 70 周年,兼论当下文学创作

70 年前,火热的革命战争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辟了文学的新时代。70 年历史沧桑社会风雨,《讲话》精神并没有被雨打风吹去,其中的一些论断在完成了历史有效性、合理性之后,逐渐隐去,而大多数论断则穿越了历史时空,至今言犹在耳,具有超越历史性的恒久价值,对于当下的现实、对于新世纪语境下的文学创作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鉴于当前的文学创作现状与文学生存语境,笔者认为重建当下文学创作的政治维度与现实关切应当是当下文学走出困境的重要选择。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讲话》中明确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重要方针,提出文艺从属于政治,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将文学定位在“工具论”的层面上。从文艺规律和文艺本质的意义上而言,这样的方针将文学置于政治的附庸地位,对文艺自身的特点与规律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显然有悖于文学自身的属性。但考虑到当时特殊的战争环境,“救亡压倒启蒙”,“救亡”成为全民族最大的政治,每个人都有责任有义务参与其中。当时的历史情境决定了“文艺为政治服务”方针非但重要,而且必不可少。以历史的眼光、辩证的思维重新审视曾经的历史现场与《讲话》精神,这样的方针无疑具有历史合理性和历史正当性。

在《讲话》精神指引下,解放区文学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涌现了诸如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李季(《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白毛女》),丁玲(《太阳照在

桑干河上》),周立波(《暴风骤雨》),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孔厥、袁静(《新儿女英雄传》)等一大批体现“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家作品。这些作品的最重要特征就体现在它们服务于时代的政治功利性。“这一历史的质的规定性又反过来成为文艺发展的动力和文艺面貌审美变化的制约性因素。主题提炼的政治革命化、题材选择的‘工农兵’化、笔触情调的大众化、功能职责的服务化和作家切入生活视角的阶级化等,不但是革命对文艺的要求,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时尚。”^①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讲话》精神的惯性延续与制导下,文艺与政治之间的从属关系非但没有弱化,相反在政治激情的催化下,作家创作了一批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品。尤其是杜鹏程的《保卫延安》与柳青的《创业史》,前者以史诗般的规模再现了解放战争的宏伟篇章,塑造出了以周大勇为代表的英雄形象,体现了“宏大叙事”的社会政治诉求。后者则极具典型性和真实性地描绘了和平时期的建设生活的时代图景,完成了由宏大叙事向塑造英雄性格的文学转变,弘扬了高昂的时代精神。尽管文学仍然是为政治服务的,但由于柳青等人具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发自内心的政治豪情,因此他们能将自己对政治的理解、能将自己的生活方式融入政治生活中去,所以政治对文学创作的高度介入并没有完全取代生活经验本身,反而彰显了鲜明的时代政治主题。同时期具有鲜明政治主题的还有《青春之歌》《红旗谱》《红岩》《红日》等。这种历史情境之下,“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各个门类彼此呼应,协同推动一个巨大的观念体系缓缓运转,在阿尔都塞所论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中,文学与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会、大众传播媒介从属于同一个结构,唇齿相依,荣辱与共。”^②

但必须指出的是,尽管解放区文学、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文学均取得了不菲的创作业绩,也有重量级的经典,但总体而言,中国这一时期的文学和西方文学、苏联文学仍存在不小的差距,没有世界级的作品问世,这和中华民族所遭受的苦难、战争、牺牲是不相称的。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文学过于附着于政治,过于表现政治主题,过于突出政治规训,过于突出阶级斗争,过于沉溺于建国后的欢乐气氛和政治颂扬,而忽略了更为广阔复杂的社会、历史、现实与生活。尤其是在表现

① 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页。

② 南帆:《四重奏:文学、革命、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第41页。

战争题材方面,我们的文学创作过于看重战争胜利的结果,而无视战争带来的悲剧性遗留,无视战争所带来的创伤、失落、破败、颓废、离散。为此,有论者指出:“西方文学与苏联文学皆表现战后的悲伤,而惟独中国文学表现的却是战后的欢乐。”^①受制于政治层面的主题囿限,那个时期的文学普遍缺乏深度的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没有能够产生类似于《战争与和平》《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老人与海》《第二十二条军规》等大师级的优秀作品,这应当说是“解放区”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的巨大遗憾。

“文革”期间的“潜文学”除外,显在的文学创作更是沦为极左政治的传声筒,成为继续革命、阶级斗争的工具,尤其是“文革”期间的革命样板戏更是体现了意识形态和政治乌托邦思维,“以政治乌托邦的方式讲述现代民族国家创立的历史和巩固这一成果的‘现实’”^②。这些革命样板戏的程式化、形式化倾向绝不意味着政治内容的虚无,“京剧的程式变成了‘形式的意识形态’,事实上,属于‘京剧’形式范围的脸谱、服装、音乐无一不显示出价值判断的意义。当观众日复一日地沉醉于这些程式时,他喜欢上的不仅仅是形式,而是形式蕴含的道德原则。”^③“根本任务”“主题现行”“三突出”等政治上的创作要求变成了文学创作的金科玉律甚或文艺宪法。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中,政治的中心地位、绝对地位导致了文学创作的概念化、类型化与图解化,进而逐步形成了工具论、从属论、反映论、认识论的文学本质观,甚至把这种文学观当作文学规律或正确论断来看待,结果导致了文学的全面枯萎,妨碍了文学的创造性生成。正如美国学者房龙所言:“把艺术公式化,把艺术弄成政治纲领的一部分的做法已屡见不鲜,但从来没有成功过,永远也不会成功。”^④

正是鉴于“文革”文学的深刻教训,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除了在刚开始的两年延续了“文革”政治话语及其思维方式外,一直在极力撇清和政治的关系,试图找寻文学的审美自律,于是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去政治化”的历程。80年《上海

① 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② 温如敏、赵祖谟:《中国现代文学专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3页。

③ 李杨:《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00页。

④ 房龙:《人类的艺术(下册)》,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年版,第696页。

文学》刊载了一篇题为《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的理论文章,从此揭开了文学疏离政治、文艺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非工具化的序幕。在之后的历史语境中,人们逐渐认为,文学是应该独立的,有其自主性的品格,政治不能凌驾于文学之上,政治对文学的强硬入侵,只会导致文学主体性、独立品格的溃败,文艺更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艺只是形象地对社会生活整体的再现、反映与表现,然而矫枉过正,由此,文学的政治维度遭到了空前的放逐。80年代,文学以审美自律、“回到文学本身”、“纯文学”的艺术诉求开始逐渐逃离政治,开始以文学的自律来疏离、对抗文学的他律。新生代诗歌强调“诗到语言为止”,先锋文学则高举“形式革命”的旗帜,他们在纯文学、去政治的审美自律的道路上愈行愈远,把逃避政治看作是对文学自身的深刻救赎。正如马尔库塞所认为的,艺术自律的产生不仅是艺术文化在理论上的一个价值论目的,而且首先是其在实践中的一种防御手段,它成为艺术的一个避难所和立足点。客观而言,创作领域一直张扬“审美主体”“艺术本体”或“情感”等文学自律的创作实践,理论领域则建构了一套文艺自律的理论知识谱系,二者的合力确实把文学从政治的束缚和工具论的禁锢中解放了出来,在新时期的历史语境中起到了重要的思想解放作用。

但是物极必反,“去政治化”的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创作与理论主张,也在新时期以来的历史语境中逐渐走向困境。一方面,过于自律的文学逐渐放弃了文学的思想使命,审美的乌托邦丧失了民族、宗教、历史、社会、文化等政治性蕴含而显得虚飘。审美自主性甚至成了某些作家逃避政治、逃离现实的借口,成了他们精神缺钙、思想犬儒的遁词。“关于文学‘自足’的想象事实上将文学‘悬置’在一个无法落实其现实性的‘空位’上。人们发现,文学已经丧失了介入社会现实的能力,文学的写作与阅读已经告别了社会公共领域而进入到个人化的生活领域。”^①先锋文学、“私人化写作”、后现代写作、历史的戏说等等文学思潮有意取消思想的深度,保持和时代、公众、政治、现实的距离,渴望在和意识形态的疏离中获取价值认同。文学从公共生活领域、公共空间大踏步地后撤到私人化的领域与空间,这不仅是文学表现领域的变化,更是文学精神与思想立场的倒退。房龙在其《人类的艺术》中所言极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是没有前途的,适应某种

① 施立峻:《公共空间与文学价值——重新审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一个视角》,《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3期,第32页。

需要而产生的艺术,为达到一定目的而创造的艺术,是永久有生命力的。”^①另一方面,相当部分文学在日益世俗化、商业化、市场化、产业化的社会进程中,逐渐走向媚俗化、娱乐化、消费化、大众化。享乐主义、流行性的消费主义文学观念也不可避免地消解文学的政治维度与政治表现,某种程度上,文学的动力不是来自内在的思想激情与政治伦理诉求,而是被欲望、金钱所劫持,文学成了大规模的复制、拼贴与文化快餐,装点着粗鄙化的转型期生存景观。文学抽空了政治内涵、失去了政治维度等于失去了自身的血脉、思想、蕴含甚至重量,变得苍白无力,这是因为政治是现实生活中影响最为深远、最为集中,也是无法“逃离”、无处不在的根本性因素。可以说,除了极端“审美主义”的特例,文学和政治须臾不可分离。新时期以来文学由于过度疏离政治,造成了文学缺少黄钟大吕式的作品、缺少民族国家恢弘的想象、缺少对现实政治的有效关怀与回应,缺少现代性进程中政治逻辑的艺术呈现、缺少史诗般的时代经典……针对这般的现实语境与文学现场,文学应当尽快重建失落的政治维度,形成良性的文学与政治的理性互动与审美对话——当然,并不一定要回到古典的“诗言志”或“文以载道”的传统,更不能回到“文学从属于政治”的历史套路与思维定势,而是要在文学与政治之间找寻恰切的审美通道,以审美表现的方式体现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的现实存在。文学不应回避政治,而是应当超越政治,超越文学与政治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超越“工具论”的本质主义文学观,同时也要超越“审美自律论”的本质主义倾向,回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主义建构。可以肯定地说,文学政治维度的重新建构,需要文学摆脱本质主义的束缚,回到关系主义的正确逻辑轨道上来。

二

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似乎不言自明——文学是现实的反映,现实、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谁能否认这一点呢?这也是《讲话》中反复强调的文艺规律。然而,不同的语境,不同的文学主张又决定了文学与现实关系的种种差异,构成不同的现实主义:莫里哀的现实主义体现了与现实、王权的妥协,突出了宫廷色彩,因此是古典现实主义;巴尔扎克、狄更斯、屠格涅夫注重对现实的批判、对现存秩序的否定

^① 房龙:《人类的艺术(下册)》,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年版,第796页。

与怀疑,持有坚定的批判精神和道义立场,因此是批判现实主义;反映“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现实进行照相式的观察与描绘,是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注重日常生存的一地鸡毛、柴米油盐是所谓的新写实的现实主义;制造叙事圈套是博尔赫斯的迷宫现实主义;还有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这么说来,文学中的现实无时、无处不在,而我们今天重提当下文学创作的现实关切似乎是一个伪命题。

但是看一看当下文学的创作实际,这非但不是伪命题而且还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不能同意德国汉学家顾彬所认定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观点,但也无法否认中国当代文学没有产生无愧于这个“大时代”的大师级作品,也无法否认当代文学创作缺少应有的现实批判精神,无法否认当代作家很大程度上的精神犬儒主义。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回避当今的社会现实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阎连科在《文学的愧疚》中毫不客气地指出:“恕我直言,我想我不会因此得罪下列我非常尊敬的作家们——有一个事实似乎应该挑破窗户纸说出来,就是那些最值得尊敬的作家们的代表作或影响最大的作品,大都和大陆今天的现实没有直接关系……这是非常值得探究的一个问题。”^①阎连科接着列举了陈忠实的《白鹿原》,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王安忆的《长恨歌》,李锐的《旧址》《无风之树》,阿来的《尘埃落定》,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张承志的《心灵史》,苏童的《河岸》《米》,叶兆言的《1934年的爱情》,格非的《人面桃花》,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李洱的《花腔》,毕飞宇的《平原》,麦家的《解密》等代表性作家作品均与中国当今的现实无关或总是隔着一层。这是当下文学至关重要的欠缺所在,面对现实存在,我们的文学失却了自己的声音,“面对社会现实,文学总是那样简单、浅薄和逃避”,与我们当下的现实相去十分遥远,“今天大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大陆作家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写作时机——这里说的最好的写作时机,不是写作的环境,不是写作的真正自由,而是大陆今天的社会现实,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混乱、复杂、富裕、矛盾和荒谬的境地。任何一个作家、学者、哲学家和思想家,想把我们的现实搞清理顺,都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生活中的故事,远远比小说的故事更为复杂怪诞、跌宕

^① 阎连科:《文学的愧疚》,《扬子江评论》,2011年第3期,第4页。